

图书馆

Qushihui

G

0 5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上海文艺出版社



马相伯 著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学者讲坛系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编 吴 格

一日谈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马相伯在权力

游戏中的不成功，

恰好表明他具有一

般政治家所缺少的

良好个人品格。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学者讲坛系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 编 吴 格

一
日
一
谈

马相伯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日一谈/马相伯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4 重印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学者讲坛丛书/吴格主编)

ISBN 7-5321-1781-2

I. 一… II. 马…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0010 号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陆震伟

一 日 一 谈

马相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s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1 字数 143,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9,500 册

ISBN 7-5321-1781-2/I·1445 定价:8.00 元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

《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者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羡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编者的话

站在世纪门槛边的中国人,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海纳百川,博取众长,向着二十一世纪迈进。回首百年风云,中国人在继承传统文化并汲取他民族文化精华以建设现代化的历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留下无数令人反思不已的话题。中国人,由于历史传统的厚重积淀,自从跨入近代以来,一直未免于步履蹒跚,进程迂缓;中国人,又由于百折不挠的坚毅自信,至终也不会甘于落后,放弃进步。溯自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冲撞以来,无数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进步与昌盛,上下古今,八方求索,苦心研讨,著书立说,用以沾溉世人,启迪后学。回顾历史,我们固然常常涌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感喟;瞩目将来,又不能不时时记取先民“温故而知新”的教诲。

民族文化的形成,得自历史的积累;民族新文化的成长,同样有赖前赴后继的追求。中国人汲取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并不始于今日;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雄视阔步,正是

凭借着前人的开拓与经验。因此,在今天的“知新”,即学习他民族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同时,切切不可忘却“温故”,即接受并借鉴前人的求索成果。漠视前人在继承传统与消化外来文化方面的已有成绩,凡事重“新”而厌“故”,将前人辛苦经营的文化遗产轻率弃置,实非明智者所当为。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固然在日日更新,但今日之“新”,何尝不会成为明日之“故”?而昨日之“故”,又何尝不能培育今日之“新”?在文化学术的领域里,有对先哲的充分敬意,有对前贤的虚心继承,才可称其能“温故”,也才可信其能“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故相循,生生不已,既是自然世界的法则,也是人类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法则。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当前的出版潮流中,既有志于为读者大量提供“知新”的读物,又有心于“温故”。现承命遴选前辈学者的传世佳作,重印以饷读者,征讨并及当代学人的未刊著述,新版以惠后学。入选各书,均诚邀专家,新撰导言,并辑作者简传附后,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助。因感主持人愿力之弘,用意之邃,故不辞谫陋,谬膺委任,幸赖师友关爱,勉强完命。因所选多为导人问学入门的小种著作,其中不乏前辈讲学之稿,故总冠以《学者讲坛》之名。编选之间,展诵多益,以己推人,如读者亦同感受益,更自荣幸。

一九九八年五月吴 格记于复旦园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百岁政治家马相伯

朱维铮

引言

在近代中国,马相伯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却在政治史上十分有名。

这位江苏省丹阳县人,出生于1840年4月7日,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初六。恰在这一天,英国议会内辉格党人,以微弱的多数票,否决了托利党人提出的反对女王政府发动对中国进行不义战争的议案,巴麦尊内阁派遣的远征军已在驶往南中国海途中。两年以后,用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习惯,即马相伯三岁那年,1842年7月,英国舰队便突入长江,攻占了马家居住的丹徒(今镇江)。道光皇帝被迫屈服,同意他的一名大臣与英国远征军司令在停泊于南京城下的英国旗舰上签订了和约。它是清帝国与西方列强正

式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被中国人引为奇耻大辱。历史学家通常把这次“鸦片战争”看作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从这个意义来说，马相伯就是中国“近代”的同龄人。

马相伯也真长寿。当他经历了五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在1911年目睹了清帝国终于被革命推倒，那时他已七十二岁了。他不但亲历了这七十年的中国的一切重大的历史事变，而且参与了其中多次事变。“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以后，马相伯还活了三十八年，并且从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起，又在共和体制下，先后见过六个总统，四任主席，以及在军阀混战中的一堆执政、大元帅、总司令、委员长等。1939年11月4日，他在越南谅山去世，时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多月。照中国的习惯计算，他活了整整一百岁。活了一百岁的政治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已经非常罕见，而马相伯还在同时代人中创下了从事政治活动最久的记录。

马相伯在三十七岁那年(1876)退出耶稣会，随即进入官场。虽然在二十一年以后，他又重返教会，却没有割断他同政界的联系。他去世前两年，还接受在重庆的蒋介石政府的任命，做了“国民政府委员”。因而，他涉足政治活动，虽然时断时续，或在朝或在野，但时间长达六十年，在同时代政治家中可称元老。

不过这位政界元老，在晚清官场，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幕僚和外交官。帝国变成民国，他的政治地位升高了，做过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员，做过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做过蒋介石政府的委员，但也没有获得过实际的政治权力。

中国人至今没有改变把权力与成功混作一谈的习惯。假如把获得的实际权力当作政治家成功与否的尺度,那么马相伯只好被看作不成功的政治家。

可是普通的中国人衡量政治人物的价值,还有别的尺度,包括道德、学问、文章等方面的个人表现。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马相伯在权力游戏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家所缺少的良好个人品格。他以百岁高龄去世,那时人们一致称颂的,正是他的个人品格。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他越到晚年越有政治声望的由来。

1. 局外旁观者

马相伯在三十五岁以前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旁观者。原因很简单,这是由于马相伯从十二岁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此后十九年,他一直在教会内学习和任职。耶稣会的戒律不允许神职人员直接参与世俗的事务,马相伯对中国政治只能采取旁观态度。

上海不是静修的胜地,却是旁观政治的前沿。自从1842年上海根据清英南京条约被辟作对西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那以后它就很快由一个江南小城变成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不仅如此,以后许多年,由于清政府顽强地抗拒西方国家在北京设置外交使馆,上海又成为中国主要的外交活动舞台。

还在南京条约刚签订不久,清帝国的官员和学者讨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大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西洋人所以能战胜天朝,无非因为“船坚炮利”,所以只要学会制造坚固

的军舰和新式的枪炮，便能对付这班野蛮人，这就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我们不知道少年马相伯有没有读过根据林则徐的意见写成的这类著作，我们只知道马相伯刚到上海便十分注意观察外国人的技术发展程度。他首先表示不佩服西方的医疗技术。这不奇怪，中医讲究辩证施治，而西医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付皮肤病就用烙铁去烫脓疮，这在从小熟悉父亲医术的马相伯看来，当然是野蛮而幼稚的方法。他接着不佩服的是外国的军舰。有天随徐汇公学的教师登上停泊在黄浦江的外舰参观，马相伯特别留心西方的大炮，发现其装置与中国的土炮，没有什么差别，不禁大失所望。他开始对清朝被英国打败，是由于技术不如洋人的解释，表示怀疑。

怀疑在马相伯的青年时代更加深了。1853年春天来自南方的拜上帝会的造反大军占领了南京，宣布它是“天京”即天国的首都，随即又占领了长江三角洲的各大城市。各省的官僚绅士富商纷纷逃到上海。然而旧上海县城也出现了头裹红巾的由广东帮会“小刀会”为主的造反者，很快控制了市郊的农村，剩下的安全区只有英、法、美等外国殖民者统治的“租界”。徐汇公学设在法租界的西南边沿，没有受到“红头”攻击，却给年轻的马相伯提供了一个对比两种统治的机会。

所谓耳闻不如目睹，马相伯在长达五年多的旁观时期，还曾私自冒险钻进小刀会控制的城区，却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市容反而更热闹了，居民生活得很自在。对照之下，租界内的华人，尽管身在安全区，却缺乏安全感。这不能不使马

相伯思考。他没有想到租界设置是否合理,但想到了“长毛”、“红头”,是不是像官绅们形容的那么坏?相传 1860 年,二十一岁的马相伯,曾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目睹了正在教堂作晨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同位教民的谈话。这位乡村居民惊问那位赫赫有名的天国“王爷”,“也信上帝念耶稣经”?李秀成只是报以和蔼的一笑,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亵渎了他的尊严。看惯了清帝国官吏在平民面前耍威风,马相伯,从中得出怎样一种反面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马相伯的家族信奉天主教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八年(1580),但那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谁都知道利玛窦万历十年才从印度果阿来中国,过了十多年才到达南京传教。在这一点上,方豪比较慎重,他在《马相伯先生事略》一文中,只说“马氏久奉天主教”,而不说究竟有多“久”,很含糊,却比较合乎历史。

鸦片战争结束了清帝国的禁烟史,也结束了欧洲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尊重。1842 年耶稣会重新来华负责江南教务。昔日照管江南教务的澳门教区的葡萄牙人,唯恐得罪清帝国而损害自己的世俗利益。如今的法国人却极力逼迫清政府来扩展自己的“精神”利益。当然,1814 年在欧洲重新恢复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之后,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吸收信徒,并且急于迫使中国信徒放弃“异教”的文化习俗。

因此,马相伯身在耶稣会,要对本国政治做个旁观者也不容易。但马相伯的尺度,有一个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政治的现状是否对中国有利。

马相伯的传记，都提到他曾拒绝就聘为法国驻上海领事的翻译，理由是：“我学法国话，是为中国用的。”这种态度，不会得到耶稣会在华当局的赞赏，他们认为马相伯有“排外”思想。

其实马相伯的“为中国”态度，与晚清的中国一般士绅的“爱国”是有区别的。他不认为中国等于某一王朝，因而不认为爱国必须忠君。他在徐汇公学长期接受西方教育，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欧洲语言，除了学习宗教经典，还读了很多的西方哲学和历史的著作，深受近代西方的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影响。他后来总是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权利平等，总是强调国家是个法人团体，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总是抨击“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专制思想，这都应该说是非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

因此，马相伯和他的弟弟马建忠，在徐汇公学读书时，对于外籍耶稣会士往往表示十分反感。马建忠曾随马相伯一起入修道院，“以中外修士待遇不平而退出”，后来去巴黎留学，“有以白种人自傲者，必折之使服”；马相伯终于脱离耶稣会，也由于“他对外国教士的不满意”（见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等）。既然在教会内部都难以忍受事实上的种族的或民族的歧视，那就更难怪马相伯对于本国的政治会用超越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例如前述他对清朝和太平军的比较，便超越了传统的“忠君即爱国”、“犯上即作乱”一类的观念，而把君民或官民是否平等作为尺度。在他看来，有利于平民就有利于中国。从这一点来说，马相伯在早期作为中国政治的旁观者，已经

开始显露他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取向。他反对种族歧视,在有白人优越感的某些传教士看来,就是有“排外”思想。但他又“排内”,也就是反对同国籍同肤色的社会内部的种种不平等,而同情受压迫受苦难的底层人民。这正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马相伯的一生的起点。

2. 从总督幕僚到国王顾问

马相伯在 1876 年放弃神职到 1897 年重返教会,中间共二十一年。

还俗的当年,马相伯便下了“宦海”,就是说登上了清帝国的内政外交的舞台。

马相伯在宦海中浮沉多年,大半时间扮演的角色是幕僚,充当达官显宦的顾问或参谋。清代的幕僚或幕友,聘用与否和待遇如何都由官员个人决定,相对地说不受资格限制,但必须是名士或专业人才,特别是同聘用者有“关系”。

据说马相伯曾为县学生员。这是否事实并不重要。马相伯即使曾中秀才,这身份也并非做官的保证。

然而马相伯没有功名,却有“关系”,同“淮系”官僚的特殊关系。

马相伯之兄马建勋,曾任淮军的粮道,即主管军粮的军需长官,同不少高级将领往来密切。马相伯在 1876 年进入其兄密友、山东布政使余紫垣的幕府,正是“关系”在起作用。

山东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管辖范围,省布政使必须从事李鸿章所热心的“洋务”,兴办各种新式

军事工业、民用工矿运输业以及办理对外事务。马相伯饱受西方教育，通晓多种西方语言，自然成为余紫垣幕中最受器重的人才。据他晚年回忆说，余紫垣在署山东巡抚（代省长）期间曾委托他处理布政使的日常工作。这事在清代官方记载中尚未发现佐证。不过余紫垣曾经委派他担任山东潍县机械局的总办，则是可信的。这个“洋务”军火制造企业的局长，属于洋务派高官的幕僚亲信垂涎的“肥差”。但马相伯却不懂做官的秘密，他把这个混乱的企业整顿得可以正常生产了，而在北京的上司却怎么也不相信他呈报的造价属实，于是他只好辞职。接着，他由李鸿章委派，再往山东调查矿务。先后在山东三年，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成绩。

另一个“关系”使马相伯成了外交官。1881年4月，曾在清廷驻法使馆与马建忠同事、并交情甚好的“洋务”名流黎庶昌，做了出使日本国大臣，遴选马相伯任使馆参赞。马相伯抵日后，改任驻神户领事。但这年秋天，他回国看望病中的马建忠，便被李鸿章留住了，被派往朝鲜。

怎么回事呢？又是由于马建忠的关系。原来，马建忠赴法国，是由李鸿章选派的，一面任职于驻法使馆，一面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仅用三年，于1879年居然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李鸿章门下荣获“洋进士”头衔的第一人。马建忠在法期间，事事都要超过白人，不但学业要争第一，连付房租之类小事，都要同白人相争，这虽使马建忠的房东太太气得发昏，却使“中堂大人”乐得拍手，认为马建忠替华人挣足了“面子”，“为外人所敬重”。那时清帝国推行“洋务”的三

大领袖，“湘系”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已老，唯有李鸿章最具实力。他也确有所谓“现代化”的眼光，看到帝国“自强”的出路，不仅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及造船工业，还需要建设从采矿、冶金到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马建忠回国，立即建议兴建铁路，以为这是“洋务”的关键，而资金困难可通过借“洋债”解决。这正搔到了李鸿章的痒处，因而更把马建忠看作奇才。回国不到一年，三十五岁的马建忠，便被清政府列名为二品衔的驻外使馆的候选人。当然李鸿章无意让马建忠离开他的幕府。他如此保举马建忠，是为了使此人能以高级官员身份代表他过问涉外军政事务。

马相伯受到黎庶昌的青睐，肯定使李鸿章不悦。贵州才子黎庶昌，早就名列“曾门四弟子”，跻身外交界则出于郭嵩焘的提携，属于湘系官僚。那时帝国驻外使馆诸官员，都由使臣遴选，也等于使臣的幕僚。马相伯赴驻日使馆任职，按照当时的官场积习来看，就意味着湘系挖取淮系的人材。马相伯回国探亲时，正值李鸿章派马建忠往南洋诸地与英国殖民当局办交涉，而感到“正缺人手”，所以一见马相伯便命他随同北上。那时李鸿章名为大学士，但所兼北洋通商大臣，在体制上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他只用一句话，便取消了由总理衙门批准任命的一名驻外领事职务，从现代眼光来看是难以理解的，却是中世纪式政坛的平凡小事，比这更古怪的现象不知凡几。

马相伯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外交官变成直隶总督府幕僚，又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幕僚变成帝国藩属的国王顾问。原来朝鲜正受日本侵逼，李鸿章便出主意要朝鲜政府与欧

美列强签约通商,借以制约日本,也就是“以夷制夷”。帮助实施这个对策的,就是马建忠。1881年冬天马相伯随李鸿章到天津,朝鲜国王派来迎候马建忠赴平壤任顾问的专使已在等待了。李鸿章当即指着马建忠的这位二哥对朝鲜使者说:“他可以代眉叔(马建忠字)去走一趟。”于是,马建常(马相伯本名)便作为他的幼弟马建忠的替身,赴朝鲜担任国王的新政顾问。

关于马相伯在朝鲜的活动,除了他本人晚年回忆《一日一谈》外,直接作证的中文材料,仅有马相伯亲笔修改过的两份文件底稿。奇怪的是马相伯既然作为帝国派驻属国的高级代表,在朝鲜的身份又是国王顾问,怎么清政府的官方文件,没有提到过他的姓名?《光绪朝东华录》保存了1881~1882年李鸿章向朝廷报告朝鲜问题处理过程的多份奏疏,甚至这里面也只提马建忠而不提马建常,为什么?通过多种记载的互相比照,我才明白其中奥妙,那就是第一,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派往朝鲜的正式顾问是马建忠;第二,李鸿章指定马建常即马相伯前往朝鲜,确实让他充当马建忠的替身,就是说马相伯赴朝鲜任国王顾问,只是出于李鸿章本人的指派。所以,他既然不是清政府正式任命的驻属国官员,也就没有代表宗主国干预朝鲜与列强之间外交事务的权力。在他任顾问期间,朝鲜与美、英、法、德都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因宫廷政变而招致清、日政府都派兵干涉,代表清政府出面监督和处理的,都是马建忠。马建忠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从清理历史事实的角度看,以高拜石《记丹徒马氏兄弟》(《古春风楼琐记》第十三篇,1966